

《岭南经济思想研究》* 序

汤照连

众所周知,我国拥有异常丰富、光辉灿烂的经济思想遗产,而岭南古近代经济思想是其重要的组成部份。

我国拥有足以自豪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古代部份)殊非偶然。中国是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早在先秦或秦汉时期,就已形成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广袤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复杂的自然条件,造成了社会经济不平衡性、差异性,从而使丰富多采的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具备了沃壤。加上自秦汉以后,就已形成的珍惜与保存前代文化典籍的优良传统和健全的制度,使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更得以继承和发展。由于上述主客观条件,中国经济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遑他让。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代表着不同人们的利益与要求的各家各派,对现实社会经济问题均进行深入的探讨或提出各自不同的改革方案,构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百家争鸣”的主要内容。特别是杰出的古代思想家孔子、孟子、墨子、荀况、韩非等,分别在财富分配、分工、交换、价值、价格、财政赋税、人口问题等方面所提出的范畴、概念、原理和分析方法,标志着中国先秦经济思想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居于领先地位。秦汉以后,中国出现了众多的有作为的改革家、理财家,如桑弘羊、刘晏、杨炎、王安石、张居正等,他们为解决当时社

会经济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财政改革,所取得的成效或经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著名学者如司马迁、王符、傅玄、李觏、叶适、邱濬、王船山、洪亮吉等,在本末、义利、奢侈、轻重、干涉与反干涉等相互关系问题上,以及土地、租税、漕运、盐务、货币、荒政、屯垦等具体经济问题上,都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著书立说,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内涵。马克思在论及古希腊思想家对经济学说的贡献时写道:“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和其他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近代科学的理论出发点。”^①历史雄辩地证明,古代中国“不仅有文学、哲学和科学上的光辉成就,也有卓越的经济思想。这些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也是一群灿烂的明星。”^②而不让古希腊思想家专美于前。

勿庸讳言,古代岭南,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在经济思想方面,无论其代表人物的人数、所涉及范围的广度以及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与中原地区相比,均有很大差距。但是,古代岭南经济思想也有自身的长处与特点。事实上,古代岭南也曾产生过一些在经济思想方面有卓越建树的改革家、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其中的佼佼者是一张九龄、余靖、邱濬、海瑞等。他们普遍较重视社会经济事务,注重发展工商业,关心

* 汤照连主编、郭小东副主编:《岭南经济思想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货币问题,特别是积极主张发展海外贸易等,初步显示出务实性、重商性和开放性的共同特点。究其原因,是因为古代岭南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固然限制了与中原地区的沟通、延缓了经济的发展,但作为儒家传统教条的轻商、抑末思想,在岭南地区可能因此而较为淡薄和脆弱。而且,历史上的岭南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较早就出现了工商业较发达的城镇。唐代广州已成为蜚声中外的商埠。加上岭南位于东亚大陆边缘,南海之滨,易于对外开放与交往。古代岭南地域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岭南的思想家,使岭南经济思想打上特殊的印记。

进至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演进呈现出与古代迥然不同的特点。这是由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近代史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人民,并与其走狗封建主义相互勾结、逐步使中国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由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近代中国先进份子掀起的“向西方寻找真理”运动,在经济思想方面,就是从西方经济常识以至西方经济学来找理论根据,以构筑中国工业化、近代化的理想方案。由传统的经济思想逐步向西方经济学转变,是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经济思想的特点。而自此以后,则是“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③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指导下,走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独立富强之路。毫无疑问,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不仅难与西方经济学匹敌,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相比也不能同日而语了。但是,这能否断言,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只是重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而毫无价值可言呢?不能。恰恰相反,它仍然具有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也具有典型的意义和较高的水平”。^④譬

如,关于学赶超西方臻至独立富强的思想,关于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外国技术、外国人才和坚持“权自我操”的思想,关于全面振兴实业、实现工业化的思想,关于重视民生、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思想,关于重视教育、“移易民心”、提高人民素质的思想,等等,都是值得我们珍贵的经济发展思想。

如果说,在古代岭南经济思想的贡献不多,影响不大,那末,在近代其情形则完全不同了。由于岭南特殊的地理位置,更由于历史的机缘,广东在近代被历史地成为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前哨,中西文化交汇、撞击的焦点,维新变法、民主革命的摇篮,从而造就了一批著名的改革家、政治家、思想家、实业家,产生了具有更为鲜明的开放性、改革性和重商性的岭南近代经济思想,而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独树一帜,独领风骚。

首先是人才辈出,志士云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阶段,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中,涌现了洪秀全、洪仁玕、容闳、何启、胡礼垣、董遵宪、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一批爱国者、改革者或革命者。他们分别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分子,在岭南近代经济思想史乃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次是回应挑战,观念创新。从洪秀全、洪仁玕到孙中山等近代岭南先进人物,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西方文化猛烈撞击面前,他们拍案而起,勇敢回应。为此,他们分别提出了旨在实现中国工业化、近代化,使中国臻至独立富强的方案、纲领、蓝图。诸如洪仁玕在《资政新篇》首创的发展资本主义各项生产与流通事业、“与番人并雄”方案,郑观应的“商战论”和发展民族机器工业的主张,代表华侨、港澳资产阶级的何启、胡礼垣关于洋债贷放是“据地奴民之计”、主张开

放“民债”的思想，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关于“以日为师”，变法图强，而又防止“全国而步趋泰西”全盘西化的观点，康有为、梁启超关于“定为工国”、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中国第一个工业化、近代化的建设蓝图及其对外开放的“大政策”、“大方针”等，虽然所使用的经济概念和分析方法，大都是属于西方经济常识或西方经济学的初步知识，但都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结晶，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课题、新战略、新概念。

再次是顺应时代，特点突出。其一是开放性。这一方面表现在岭南代表人物都利用有利的人缘、地缘条件，直接间接地吸纳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常识和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初步知识，以转变传统的经济思想，设计中国工业化、近代化的方案。可以说，洪秀全、洪仁玕、容闳、郑观应、黄遵宪、何启、胡礼垣、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均无一例外。他们除了都是粤人，长期生活在广东这个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汇点外，又或在殖民地的香港、澳门进行过短期考察或较长期的生活，更或在外国留学、游历、从事政治活动或被委派为外交官员而从事本职工作，因而易于间接、直接地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和抽象难懂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他们坚决反对闭关自守，主张学习西方，对外开放。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在广东厉行禁烟，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林则徐，就率先提出学习西方“长技”，并利用“广东利在通商”的优势，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了解西方，以商养战，成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后来的洪仁玕、郑观应、何启、胡礼垣、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实际上都是沿着林则徐指明的路前进。特别是在孙中山身上，这种开放性就更显得集中和鲜明。他坚决反对“闭关锁国”政策和“荒岛孤人”思想。他明确提出，“要学欧洲”，“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他把《实业计

划》又名之为《国际共同发展计划》，寓意深远。他坚信，以欧美为师，对外开放，中国必能“转弱为强”、“后来者居上”。

其二是改革性。纵观近代岭南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一以贯之的是他们在强调学习西方、对外开放的同时，又要求积极地、逐步地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改革，以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实际情形是，最先他们只是着眼于西方的“船坚炮利”，谋求改造中国落后的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后来，他们又发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欧美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又经过若干年的摸索后，人们深感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输出的严重威胁，于是“商战论”和“以商立国”的口号风靡一时；不久，这一口号又为“定为工国”、“以工立国”，振兴实业所取代；后来，当意识到依靠经济改革并不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时，政治改革要求便提上了日程而出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这就是自上世纪中叶至本世纪初，岭南代表人物（其实也是整个中国先进分子）改革思想的改革实践演变的轨迹。不管他们主张采取哪种改革方案，但要求改革，谋求进步，则是共同之点。

其三是重商性。这集中体现在郑观应“以商为本”、“以商立国”和“商战论”为主要内容的重商思想上。王韬、蒋福成较早提出了“恃商为国本”、“商握四民之纲”的观点。但这种重商观点只是到了郑观应手中，才被推到了极端的地步。郑观应提出了“以商为本”、“以商立国”的观点，将发展近代商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商战论”，认为“商战”即经济侵略比“实战”更具隐蔽性和危险性。故“西人以商为战”，“商能灭人之国”。中国必须“习商战”以对付西方的“商战”，发展工、矿、农、交通各业，在国内外市场上与洋货广泛进行“商品战”。郑观应这种相当典型的重商思想，虽然很快就被后来康、梁的“商务”、“以工立国”，以及孙中山的振兴“实业”的新概念所代替，但以商为出发点观察

问题的重商观点一时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虽然已提出“定为工国，讲究物质”的构想，但仍把商业作为中心去探求国民经济各部门与商业的关系，强调与西方进行“商战”的紧迫性。

显然，近代岭南代表人物这种既崇商又恐商的重商思想，既与古代封建经济中（邱濬等人）的重商意识不同，也与作为“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⑥的西方十五至十七世纪的重商主义不同。这是近代中国也是岭南独特的经济概念。存在决定意识。郑观应这种极端强调商业、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商思想，既与他本人的商人身份、商人经历有关、也与广东的商业环境、商业意识分不开。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也是由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不足所决定的。这种过份强调流通作用的肤浅的经济观点，正是幼稚的、不成熟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至于郑观应非常典型的“商战论”的产生，显然，一半是由于对历史上欧洲殖民主义国家贸易战争争夺海外殖民地的一知半解，另一半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民族工商业者面对着西方资本主义廉价商品倾销大潮的冲击而产生的恐惧心理之反映。

有必要指出，我们重视总结岭南古近代的经济思想，决不是对岭南经济思想的一段辉煌历史表示迷恋或自我陶醉，而是出于为现实服务的动机。浅近一点而言，是对近期出现的岭南文化研究热略尽绵力，^⑦推广一点而言，是试图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广东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诚然，古今建设的目的、途径、方法、规模、结构、条件、动力等根本不同，因为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和迎接未来。搞现代化建设，“国情”、“省情”这个因素绝对不容忽视。这是一。社会经济活动，社会再生产过程，社会经济的发

展进程，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虽有其特殊的规律性的东西，但也有其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在起作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某些社会经济问题极有可能以变换了的某种形式、性质和程度而在现代社会重演，而使人们深感困惑。因而前人的某些经济观点、分析方法，极有可能给现代的人们一点灵感，一点机敏，一点解决问题的方法，更不用说还可以提供某些历史教训而使人们避免重蹈覆辙。这是二。不过，如果在这里要求我们具体地说明古近代岭南经济思想有哪些观点、主张、方案适用于今天，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适当的。我们可以做到的，只能是把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感受较深的某些岭南经济思想的精华提出来以供经济决策的参考，这就是：关于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思想，关于学习西方与赶超欧美的思想，关于富国与富民的思想，关于工业化、近代化的思想，关于重视农业、民食与民生的思想，关于“广东利在通商”即重视对外贸易的思想，关于重视人口、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素质的思想，以及广州建设与穗港关系的思想等等。

注释：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5页。

②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页。

③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④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第376页。

⑥如丁宝兰主编的《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李锦全、吴熙剑、冯达文编著的《岭南思想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李权时主编的《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责任编辑 杨宗传）